

世林漫錄

十三集



学林漫录

十三集

中华书局

**封面题签** 程千帆  
**封面设计** 谈冰玉  
**编辑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 学林漫录

十三集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9 1/8 印张 · 1 插页 · 216 千字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湖北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4000 册 定价：13.00 元

---

ISBN 7—101—00620—5/Z · 63

# 目 录

蔡元培的青少年时代	牟小东	(1)
略谈唐文治先生的行谊和学术	陈祥耀	(12)
读《浦江清日记》追记	王季思	(22)
怀念恩师孙毓棠先生	胡如雷	(29)
我所知道的王仲荦先生	张忱石	(37)
忆冯沅君师	张忠纲	(52)
坚净居随笔	启 功	(59)
墐户录(十一则)	罗继祖	(67)
“蒙汗药”续考	村 愚	(79)
《诗经》三题	李家树	(82)
王粲患麻疯病说	周勋初	(88)
从七步诗的由来评曹植诗的整理	黄永年	(94)
梁陈作家识小录	曹道衡 沈玉成	(103)
韦楚老和韦楚	吴企明	(109)
温庭筠交游补考	梁超然	(114)
张元干世系考	官桂铨	(120)
孔雀虽有毒 不能掩文章 ——谈严嵩	金性尧	(130)
明代戏曲家陈汝元考略	吴书荫	(135)
《方以智诗词书画略述》正误	蒋国保	(143)
林纾轶事二三则	林 薇	(151)
《碧玉懈叶》笺证	周绍良	(156)

关于日本所存《观音音应验记》	孙昌武(165)
明刊文秀堂本《西厢记》考	蒋星煌(174)
《金瓶梅词话》校余札记	戴鸿森(183)
文廷式日记五种汇录	陈左高(193)
《旧都文物略》小记	邓云乡(201)
董仲舒与古文献学 ——兼谈经今文学在古文献学上的特点	孙钦善(210)
<b>“浙江财团”中的两大藏书家</b>	
周子美撰集书目二种序	周采泉(219)
劬堂史学论文选集序	胡道静(226)
中日汉诗因缘	苏渊雷(231)
《史记》书名始自魏晋说质疑	王岳尘(248)
“蒲将军”与英布为二人	黄朴民(251)
《魏书》中关于李庶先世郡望的公案	王 素(257)
白居易文章被窃记	顾学颉(263)
芙蓉何处送辛渐	夏宗尧(267)
沙堤小证	辛德勇(273)
周敦颐佚诗考	谢先模(275)
两个苏小小	王稼句(277)
龚自珍的名字与别号	陈恒富(283)

# 蔡元培的青少年时代

牟小东

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内笔飞弄一个商人家庭里。

辛亥革命后，绍兴府废除，山阴与会稽两县合并成绍兴县，现在改为绍兴市。绍兴是我国东南近海的一座小城市，位于杭州湾南岸。它是宁绍平原的一部分，东邻上虞，南界嵊县，西接诸暨，北靠萧山。这里河网纵横，土地肥沃，素称鱼米之乡。城郊不远的地方，有兰亭、鉴湖、会稽山、大禹陵等名胜古迹，山明水秀，风光宜人，是游人应接不暇的好地方。蔡家居住的笔飞弄附近，有许多古迹，如笔架桥、题扇桥以及相传是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故宅后来改作寺院的戒珠寺，还有戒珠寺后面的蕺山，人们管它叫“王家山”。这些地方都是因与王羲之的故事有关而得名，所以从幼年时代起，蔡元培对绚丽多彩的中国文化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向往。

蔡元培出生时，这座城市还是清王朝统治下的绍兴府，城内分属会稽和山阴两县管辖。当时这里只有一些小手工业、茶馆、酒肆、当铺、药店和卖杂货的商户，分散在全城。石板铺成的街道两旁，随处可以看到一些悬挂着“进士第”、“大夫第”、“翰林第”一类匾额的大小台门；错杂其间的则是许多低矮而破旧的小屋，那是微贱的小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的住处。就在这类旧式的建筑物中，还夹有教堂的异样的尖顶，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

留下的历史见证。

蔡元培出生的年代，我们的祖国风云变幻，灾难深重。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已经走到历史行程的尽头，古老的封建帝国，早已霉烂、腐朽，只不过是在闭关自守的条件下苟延残喘而已。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炮舰轰开了沉睡的老大帝国清王朝的大门。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古老落后的封建社会，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八五六年，爆发了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延续多年，结果又是中国出让主权和割地赔款。沙皇俄国也趁火打劫，从多次不平等条约中，霸占了中国多达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蔡元培的青少年时代，又爆发了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不败而败”的事实，更加暴露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洋务“新政”的软弱无能。一向妄自尊大的清朝皇帝却跪在洋大人的脚下，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一条条锁链似的套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中国人民日益深重的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惨遭荼毒。

但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广州城郊三元里人民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成延烧不断的烈火。一八五〇年开始发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前所未有的革命雄姿，登上中国近代的历史舞台。它有力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显示出中国人民才是中国历史的脊梁。

中国近代史就这样在卑鄙的贩卖、镇压和英勇的起义、斗争中不断演进，一步步迎来如恩格斯所预见的“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蔡元培的故乡，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之一。这里的人民在长期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下，培育出一种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荣传统，所以古称“报仇雪耻之乡”。二千多年前，越王勾践在这里卧薪尝胆，艰苦复国。宋末和明末，这里的人民都曾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史篇，出现了陆游、王思任这样富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斗争精神的著名人物。就在蔡元培降生的前七年，这里的人民在太平军革命精神的鼓舞下，群起殴打到昌安门外劫掠的“炮船楚勇”，并将绍兴知府打成重伤，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军向绍兴的革命进军。当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太平军，进攻绍兴城时，这里曾进行过英勇的保卫战。帝国主义洋枪队的一些头目，先后被击毙在绍兴城下。太平军进驻绍兴，虽然只有一年零四个半月的时间，但却留下了卓著的功绩和珍贵的文物。总之，绍兴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宝贵精神，给予后代子孙以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蔡元培的先世明末由诸暨迁到山阴，最初是经营木材业，因为遭到同行的忌妒，被人砍伤，以后就不再搞这种行业了。到了他的高祖时代才又开始经商，他的曾祖排行第四，曾祖的三哥在广东经营绸缎业，因为偷关被捕，要处以死刑，家里倾家荡产去营救，才免于一死。蔡元培的祖父蔡嘉漠，是当铺里的经理。清代读书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之外，还有几条岔路可走。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生，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一些。其三是学幕，就是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叫做“师父”，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能做的事了。蔡家选择了最后一途。

一般说来，典当行业的老板是靠剥削压榨贫民发家致富的，然而蔡嘉漠却交易比较公平，在乡里得到人们的好评。蔡元培的

父亲蔡宝煜是钱庄的经理，为人忠厚，对家里的人无论大小都是一律平等，一样爱护，没有分别，所以家人说他“爱无差等”。他对待朋友一向宽厚，有人向他借钱，他总是有求必应，对于欠债的人又不忍去索还。太平军攻占绍兴后，革命洪流有力地冲击着这个家族，蔡家各房的生计多数一蹶不振。蔡元培的家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蔡元培十一岁时，蔡宝煜病故了，家里几乎没有任何积蓄。蔡元培的母亲周氏是个性格倔强的家庭主妇，从不依赖别人。世交当中有人要筹款接济他们母子，周氏坚决不肯，婉言谢绝。她典当衣服首饰，勤俭持家，抚养几个儿子成人。蔡元培兄弟姐妹七人，后来大哥元芬，在上海一家石印局任职，三弟元坚，在绍兴钱庄业里做事，两个姐姐都在没有出嫁时就病死了，幼弟幼妹也很早就夭折了。

母亲周氏，教育自己的儿子要自立，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做，不要依赖别人。这就逐渐培养了蔡元培自立和勤奋的习惯，所以来他做了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仍然自己动手洗衣服，从不让别人洗。周氏常常告诫自己的儿子：每当有事和人谈话的时候，先要想一想对方会说什么话，我应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等谈完了以后，要自问一下，对方曾经说了些什么，自己又说了哪些话，这些话有没有毛病，这样做可以少讲错话，少办错事。据蔡元培的长子蔡无忌转述：蔡元培小的时候与三弟元坚跟着保姆下楼，楼梯很高，必须让保姆抱着下来。保姆先抱三弟元坚下楼，然后再来接蔡元培，于是就把他一个人留在楼梯口等着。保姆抱元坚下来以后，刚好要做别的事，就把蔡元培给忘了。而蔡元培呢，就一直坐在楼梯口上，等了好久一动也不动，也不呼喊家里人来抱。后来家里人都夸他小小年纪能如此安详稳重，将来必定成为大器。父母的言行，对蔡元培的性格有直接的影响，他的宽厚待人有父亲的遗风；他的不苟取、不妄言的

品德，是母亲教子有方的结果。

蔡元培乳名阿培，进私塾后，取名元培。原字鹤卿，后改字仲申，别名鹤庼。在爱国学社时，常用“民友”为号。他主编《警钟日报》时，认为“我也是国民一分子，怎么叫民友呢？”于是从《诗经》“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各取一字，改号为孑民，以后便一直用这个别名。

蔡元培的父亲排行老大，几个叔父或是绸缎店的经理，或是钱庄的老板，只有六叔铭恩是个读书人，后来补了个廪生。在铭恩以前，蔡元培的祖上没有过读书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岁时，父亲给他请来塾师在家中授读。跟儿童的生活兴趣相违背的是古老的封建教育。那时绍兴把小孩子上学叫做穿牛鼻。就是说，小孩子上学以后，就像穿了牛的鼻子一样，要被牵着走，从此不自由了。本来初上学的小孩子，有读《三字经》的，也有读《千家诗》或先读《诗经》的，然而蔡元培并没有读这些。他读了《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部小书以后，就读《四书》。据蔡元培回忆：读三部小书和《四书》的时候，先生是不讲的，《四书》读毕，读《五经》，先生才讲一点。然而《四书》对于六七岁的孩子却一个字也不懂。比如念《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树”时，就教学生跟着念，先生从来不讲解是什么意思。《大学》、《中庸》本来是《四书》里著名难读的两本书。蔡元培幼年时代绍兴一带就流传着一首儿歌：

大学大学，  
屁股打得稀落！  
中庸中庸，  
屁股打得好种葱！

小孩子不懂《中庸》里的文句，而且读不进去，反而有时遭受先生的责打，是深可同情的。这种教育方法把孩子从入学前的蒙昧引

向另一种蒙昧。每天的功课，无非是刻板的背书、听书、习字、对课，此外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经济不宽裕，请不起先生，蔡元培就到姨母家附近搭了一年的学。后来又在一位李先生家附读了两年。私塾里蒙昧的教育方法并没有难倒蔡元培。他从小就刻苦好学，家里没有钱买油供他晚上点灯读书，他常常借着灶火的火光夜读，久而久之，他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把《四书》、《五经》攻进去了。先生和同学知道了都称赞他有萤雪苦读的精神。

六叔铭恩，善于写八股文，收了很多学生。铭恩也会作诗和写古文，家里藏书不少。蔡元培十几岁的时候，在六叔的指点下，阅读了《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打下了很扎实的文史基础。他后来走上做学问的道路，和他青少年时代酷好读书以及六叔的循循善诱有着密切的关系。

说起蔡元培的酷好读书，还有着一段有意思的趣闻。他小的时候在楼上读书，一天晚上家里失火，全家都很惊惶，叫他赶快下楼，而他正集中精力在看书，丝毫也没有察觉，态度仍然镇定自若。事后，家里人都夸奖他小小年纪能临危不乱，遇事不慌，专心致志地读书，真是难能可贵。

给少年的蔡元培影响较大的，还有他的先生王懋修（子庄）。他从十三岁起，就拜同乡王懋修为师，学了四年。王懋修也是以善于作八股文出名的。王懋修博览明清两朝的八股文，常常讲点八股文家的故事，也好谈明代的历史掌故，不时地对学生讲一些宋儒朱熹和陆九渊异同的地方。尤其佩服吕晚村，把清初曾静一案的文字狱详细地向学生们讲过。王懋修最佩服刘宗周（蕺山）的学问和道德，所以命名自己的书斋为“仰蕺山房”。王懋修也好碑帖，喜欢阅读《金石萃编》一类研究金石的书。蔡元培对他的先

生有过如下的一段回忆：

有一日，先生对一位朋友念了“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两句话，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学，笑着说：“先生念了《西厢》的淫词了。”先生自己虽随便看书，而对于我们未成秀才的学生，除经书外，却不许乱看书。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国志演义》，看了几页，先生看见了，说：“看不得，陈寿《三国志》，你们现在尚不可看，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战国策》，也说看不得。先生的意思，我们学作小题文时，用字都要出于经书；若把《战国策》一类书中的词句用进去，一定不为考官所取。所以那时我们读书为考试起见，即如《礼记》里面关于丧礼的各篇各节，都删去不读，因为试官均有忌讳，决不出丧礼的题目；这样的读书，照现代眼光看来，真有点可怪了。（蔡元培《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见《蔡元培选集》第323页）

蔡元培所说的作小题文，就是指八股文。八股文是明清科举制度规定的一种考试文体。立论、发挥都要以《四书》为根据；全篇分破题、承题、起讲等八个部分，后四部分各有两股对偶文字，形成八股。八股文的题目都是出自《四书》上面，叫做“代圣人立言”。破题是开头的两句话，必须把题目的意思说清楚，这就叫做“破”。俗话说“破题儿第一遭”，就是借用这个意思。八股文里写出来的都是圣贤，所以破题上也有一个规则，便是破孔子时务必称“圣人”、孟子等人则称“大贤”或“先贤”，此外一律叫做“时人”。例如题目是《三十而立》，这是孔子说的一句话，因此破题就说：

圣人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板凳椅子而不敢坐焉。

习作久了，蔡元培渐渐对内容空泛、形式死板的八股文，产生了厌烦心理。

因为受王懋修的影响，蔡元培二十岁以前，对于宋儒崇拜得

五体投地，最突出的表现是他恪守孝道。他十七岁那年，母亲病了，他亲自侍奉汤药，可是一直不愈。他早就听说过，叔父纯山的母亲久病不愈，纯山就割臂上的肉放在药里给他煎服，传说这位老奶奶因此而延长了十二年的寿命。于是，蔡元培也仿效纯山的做法，偷偷地割了自己左臂上的肉放在药里煎，然后送给母亲服用（据说，割臂进药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就不灵了）。三年以后，母亲病危，三弟元坚又割臂疗亲，但是没有效果，母亲终于去世了。为了给母亲守孝，蔡元培要实行寝苫枕块的古礼（古代礼教，子从父母之丧起，至入葬期间，不住寝室，睡在草席上，以土块为枕），被家里人阻止。一天，他在夜深人静以后，忽然挟着枕席到母亲棺木旁去守灵。兄弟知道他如此坚决，无法阻止，只好在停棺的厅堂上安放床位，兄弟三人都睡在那里共同守孝。母亲的丧事办完了还没有下葬时，大哥元玢提出来要给蔡元培订婚，蔡元培一听这消息就大哭不止，连忙去找大哥说：“母亲还没有入土就给我议订婚事，这是最大的不孝，我死也不能同意。”大哥见他情意真挚只好安慰他说：“你既然这样坚决地遵守古制，我也不好勉强，那就等葬埋了母亲再说吧。”过了若干年以后，已经放弃了宋儒观点的蔡元培，回顾自己的这段情况时说：“我当年类似这种拘泥于旧礼教的迂腐举动是很多的。”

一八八三年，十七岁的蔡元培参加县考。县考是件小事，在清朝还举行科举的时代，每年在各县都有一次，并不是稀罕的事情，但是它的意义却很重大。这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出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这如同从前买奖券，只要花几块钱就可以去买，有人居然得中头二等奖，顷刻间发了大财，但有人而且还是大多数，连中末尾也没有份。这样可以一年年地考下去，到了须发皓白了，还是提了考篮做“考相公”。踊跃走进这个命运的赌博场里去试试自己运气的人还不

少，会稽一县的考生就有五百余人，山阴县的考生就更多一些。蔡元培在这次县考中考中了秀才，全家都为他改换门楣庆贺。中了秀才以后，他就不再到王懋修先生那里就学，而是自己自由阅读了。他的求知欲十分强烈，读书的范围又很广泛，家中拮据的经济状况使他没有力量买书，只好把六叔铭恩的藏书借来阅读。这时，他补读了《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穀梁传》、《大戴礼记》等重要典籍。同时，他的兴趣正在往考据和词章方面转，凡是有关考据或词章的书，就随意地阅读，涉猎的范围更为广泛。

从此，蔡元培不再攻取应试的诗文，他专心去研究解说文字的小学和儒家经典的经学，以及写对偶句为主的骈体文。他偶尔在书院也作一些八股文，可是他这时写的八股文往往用古书中相通的字或假借的字来换掉常用的字，用古书奇特的文法改换常用的语法。他写的“怪八股”一般人看不懂，但是书院的院长、名进士钱振常、王继香却很赞赏。他还特地去拜访隐居乡间的前辈平步青。平步青既重视他认真求学的精神，又顾虑他思想新奇，怕给自己招来麻烦，所以有的时候就有意回避，然而蔡元培求教心切还是经常登门拜访，平步青很受感动，后来两个人结成了师友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厚的情谊。

到了二十岁的时候，经六叔铭恩的介绍，蔡元培到同乡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校订他家所刻的书籍。徐树兰是光绪初年的举人，曾做过兵部郎中，后来改任知府，因为母亲得病辞官回到家里，在地方上做一些公益的事。徐家的古越藏书楼，藏书很多，蔡元培帮助校订了《周易小义》、《群书拾补》、《重论文斋笔录》等书，而且自己在这里也阅读了很多书。在徐家整整三年的时间，蔡元培有机会博览群书，学问有了很大的长进。

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二十三岁的蔡元培与王昭女士

结了婚。这一年他到浙江省城参加乡试，写了三篇“怪八股”，得到了主考李文田很好的评价，因而中了举人。后来有人追忆蔡元培因为写“怪八股”而出名的情况时说：

浙江闹墨中，有人作了三篇怪八股，能得风气之先。人们估计他大概是一个怪诞的老秀才，殊不知蔡元培当时乃是一位朴朴实实的青年学子。他的三篇怪八股，被选中《通雅集》中，以为压卷。《通雅集》是一部怪八股文的专刊，此书一出，一时摹仿而优秀的大有人在，后来浙江乡试癸巳（1893）、甲午（1894）两科，写这样文章中举的有数百人之多。清真雅正的八股家为之太息，认为出了“文妖”。果然不出数年，八股的气运也就告终了。其实所谓怪八股，仅仅是多用周秦子书上的典故，为读书人吐气，打倒高头讲章而已。也可以算作新文化运动的前奏，如同抛出了一枚香烟罐做的粗制炸弹。（吴敬恒《四十年前之小故事》）

尽管在一些地方的乡试中，以写“怪八股”中举的人不少，但是当时的大多数读书人还视陈腐的举子业为正统，清廷的考官也仍然以能写传统形式的八股文为取士的标准。可是，蔡元培却不然，他不仅在乡试而且到北京会试当中，也依旧作他的“怪八股”。他这种不随波逐流，把功名禄利视如浮云的态度，确实难能可贵。虽然他在乡试和会试接连告捷，两年以后殿试，又被点录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不久就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就补授翰林院编修，但是在蔡元培说来，这些步步升级却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

既然到了北京参加会试而且告捷，为什么还推迟了两年才又补应殿试而中进士呢？这里有原因的，据蒋复璁转述：蔡元培会试以后，把他所作的文章送给他乡试时的主考李文田看。李文田认为他写的是“怪八股”，不合乎科举的要求，没有希望考中。

蔡元培相信了这样的判断，于是就立即离京南下。谁知他走后不久就放榜，他却名登榜上，但是已经来不及赶回来参加殿试了，只好等到下一次壬辰（1892）科补应殿试。（见蒋复璁《蔡元培先生的旧学及其他》，《传记文学》第184期，1979年9月台湾版）

清朝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对于蔡元培的才华是很赞赏的。蔡元培被点名翰林院庶吉士之后，去拜见翁同龢，翁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话：

新庶常蔡元培，号鹤青，绍兴人，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在绍兴徐氏校刻各种书。（翁同龢《翁文穆公日记》，19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一八九四年，蔡元培在北京应散馆考试，由庶吉士升补翰林院编修。年仅二十多岁的蔡元培，这时已是一个才华四溢，声闻当代的名翰林了。

# 略谈唐文治先生的行谊和学术

陈祥耀

唐文治（1865—1954），号蔚芝，晚号茹经，江苏太仓人，后徙居无锡，卒于上海，年九十岁。唐先生于一九二〇年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原名国学专修馆），担任该校校长三十年，提倡“国学”，主张读经，有些人误认他是个守旧人物，是复古派。其实，唐先生早年思想开明，是维新派；后来也并非真正复古。

唐先生二十八岁（1892年）中进士，主考座师是翁同龢，评其试卷云：“经生之文，必有静穆之气，此作是也。经艺渊雅，不使才锋，策赅博。”深加赏识。引见后分派户部江西司主事，翁氏又请他为家庭教师。三十岁时（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发生，清军战败，日军占领旅顺、大连等地，国家危机严重，先生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认为“方今中国之积弱，非一朝一夕之故，苟非举宿昔之弊，一切扫除而更张之，则万不足以固邦本而御外患”，提出八条具体建议：（1）“宜正人心，别流品”；（2）“宜务刚断，严赏罚”；（3）“宜奖气节，去阘冗”；（4）“宜正官常，破资格”；（5）“宜拔真才，变科目”；（6）“宜改武科，用火器”；（7）“宜联邦交，简使臣”；（8）“宜塞漏卮，节浮费”。前四条针对清廷行政、用人的腐败；第五条主张改革科举制度，除试“经义”外，还要加试军事、地理学及自然科学知识；第六条主张改革武科试弓矢刀石的旧制，应试的要通过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的学习，通晓新的军事学和新式武器；第七条针对清廷外交